

中國古文獻研究叢書

中古文學文獻學

劉躍進 著



中國古文獻研究叢書

G257.35/2

11.2.35



KBD 52/08

劉躍進 著

中古文學文獻學

江蘇古籍

中古文学文献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

著 作 者 刘跃进
责任编辑 吴伟斌
责任校对 杨传凤 沈静明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邮编211100)
印 刷 者
开 本 1/32
印 张 14.125
印 数 1-2000册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519-905-1/G·134
定 价 17.00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古文献研究丛书》是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这个项目旨在反映我国当代部分学者研究我国重要古籍所取得的新成就。

我国的古文献浩如烟海，其整理研究工作也源远流长，历代都有贡献。尤其是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古籍，由于在各个时代反复进行整理和研究，所以已积累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由于这些古籍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各个时代的学者又各自立足于他们的时代，带着各具特征的学术视野、观点与方法来进行再认识；所以，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虽然一再重复，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重复的工作在整体上却具有推陈出新、步步深入的特点，是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得到创造性传承的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进程。这样的进程显然在将来也要继续下去。

前些时候，围绕着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曾有过激烈的思想论争，通过论争也取得越来越明确的共识。那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越是对外开放

便越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熏陶能够加深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养成，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工程中，对于重要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些重要古籍事实上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它们不但传承悠久，而且从古至今都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站在自己的伟大时代，完全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的原则，进一步认清这些古籍的本来面目，并更为科学地评估它们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古文献研究丛书》的作者，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中青年学者。这些学者都受过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广的认识，并在各自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提高了关于中国古文献学的造诣；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也对各种外来的学说和研究方法有所了解或吸收，因此具有在学术上反映时代特色并继往开来的潜力。但由于本丛书是属于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研究项目，因此各书的内容仍以对古文献的考证为主而兼及其它论述。各书的研究形式并不一致，除多数为专书研究外，也有专题研究与论文集。但在学术质量方面则有统一的要求，即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学术观点上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广泛掌握实际材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由

于各书都以考证为主，因此所有作者不管在研究中吸取什么新的方法，都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朴学”的谨严作风，以实学为前提，对所有结论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力戒浮言臆说，绝不故弄玄虚。至于这些要求在实践中究竟做得怎样，则敬祈学术界人士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由于组稿有先后，交稿有迟速，所以本丛书采取分批出版的方式。现在，学术书刊出版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江苏古籍出版社却本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做实事的原则，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优先安排，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保证出版工作高质量地完成。对江苏古籍出版社所作的一切努力，本丛书编委会谨表谢意。

《古文献研究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六月

序

任何一种科学的发展，实际上都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因此，一个研究者在他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中要有所发现、有所推进，都必须充分总结前人的成果，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发展。否则要想取得较好的成绩无疑是很困难的。刘跃进同志的这本《中古文学文献学》的撰作宗旨，正是为着这样一个目的。

近代的学术大师黄季刚先生曾经用一个典故，生动地告诫学生们要充分注意所研究问题的历史和现状。他对那些闭门造车不了解过去和当前已有成果的人称作犯有“辽东白豕病”。说的是从前辽东地方有个人，看到家里养的猪身上长着白毛，就认为是奇特的珍品，就赶着它去献给皇帝，以邀重赏。但他在去往京城的半途上发现那里的猪长白毛的很多，才自知少见多怪，只能默然而返。这虽然是一个寓言，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者却不无借鉴的意义。试看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的文章，有时其基本观点是今人甚至清人所早已说过了的，却又自诩为创见。这种例子就和“辽东白豕”的故事，颇有几分相像。当然，这种情况也有所不同，有时后人研究的结论，虽与前人相符合，而在论证上更趋细密，材料根据更为翔实丰富，也可以有很高的价值。例如，东晋时出现

的伪“古文尚书”，从宋元以来，就不断地有人提出怀疑，而真正加以论定并为大家所公认的则当归功于清人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其后的惠栋、程廷祚等人又加以补充发明。所以我们至今认为研究《尚书》问题时，阎、惠、程等人的著作为必读之书。但在另一种情况下，重复别人已有之说，就难免犯“辽东白豕病”之讥。在这方面，我自己就有过教训。十多年前，我读《北堂书钞》，见到卷一百五十七引了晋代张华的诗句“清晨登陇首”，又见范文澜同志的《〈文心雕龙〉注》中提到《诗品》引用此句而未知所出，就自认为创获，写成札记加以发表。后来阅读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才知道这个问题，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由前辈学者解决了，因此后来拙文结集出版时，就将此条删去。这个例子既说明我自己读书不博，也说明了我平时对前人研究成果缺乏必要的了解。

还有一种情况实质和“辽东白豕病”相近而表现则有不同，这就是对前人或同时人早已充分论证且为多数人所公认的结论一无所知或视而不见，依然沿用着已经被证明不对的说法。例如，前面讲到过的伪“古文尚书”，经过阎若璩等人考证，早已论定为伪作。但在近年来竟还有人把它当作上古的真实史料来引用，就是一个例子。又如南朝诗人鲍照的生年问题，清代人陈沆在《诗比兴笺》中曾根据《拟行路难》推测为晋安帝义熙元年(504)。近人吴丕绩先生《鲍照年谱》就据此立说。但根据这个说法，鲍照的享年应为六十二岁，与南齐虞炎《〈鲍照集〉序》所说的“时年五十余”不合。同时，现代不少研究者还提出《拟行路难》未必是一时之作，并从诗中找到了内证。可见陈沆、吴丕绩的说法，恐怕很难视为定论。但现在也还有一些同志在讨论鲍照的生年时，还继续采取

这一看法。对这两个例子，似乎也可区别对待。探讨上古史而误据伪“古文尚书”（如果不是某些先秦古书中曾引用过的佚文），这终究是一大缺陷。至于陈沆、吴丕绩关于鲍照生年的推测，如果还有人坚持，这也未始不可，但总要对别人所提出的《拟行路难》非一时之作和虞炎所记鲍照的享年之数提出有力的反证，否则就很难叫人心服。

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都说明了我们的研究者在从事研究工作时，都必须重视和总结前人或同时人的成果问题。但这些事例，还只是为了消极地避免错误或不确实的论证。我们要了解前人和同时人的研究情况，主要恐怕还应该从积极方面着眼，也就是说，在前人和同时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哪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解决；哪些问题虽已有较一致的看法，而还有待于完善和深化；而且从这些已有的结论中还可以联系哪些方面，进而解决另一些新的学术问题。这对于每个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从本书中论述到的不少学术问题看来，它们常常能启发我们去思考，并对自己过去的看法提出怀疑和反思。例如，关于《文心雕龙》的成书究竟是在南齐还是梁代的问题。我过去也曾见到过一些同志的文章主张《文心雕龙》作于梁代，但始终相信《时序篇》中“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诸语，对新说很少加以考虑。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在某些论证方面似乎还不够成熟，但这个结论也不能轻易忽视。例如，有的同志举出《序志篇》中用《周易·系辞传上》“大衍之数五十”一语典故，改“衍”字为“易”字，是否为了避免梁武帝萧衍的名字，这就很可思考。这种例证，当然还不能说是铁证，因为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庾阐作《扬都赋》，曾因庾亮要看，而在文中改去“亮”字，可见掌权大臣的名字有时也可能避免使用。

另外，在古籍中也还有不少追改之例。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一部著作的写成常常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刘勰开始写作《文心雕龙》时可能是在齐代，而全书的完成却在梁时，因此兼有齐梁二代人的口吻，也不是不可能的。像这种有争论的问题，在一部文献学著作中，能够并列众说加以对比，往往更能对读者提供必要的启发。

在提出这许多问题时，刘跃进同志是经过深入细致的考虑的。例如关于钟嵘《诗品》三篇序言的位置安排问题，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版本的不同。但究其实质则涉及到钟嵘对谢灵运、沈约等重要作家的看法，甚至关系到钟嵘对元嘉、永明诗风的态度问题。这和前面讲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南齐还是梁代的问题一样，都涉及到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相互关系，甚至和一代文学思潮的变化密切相关。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作者显然不限于介绍学术界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论争，而是把这些问题作为整个齐梁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各个环节来思考的。在他撰写到这一部分时，曾对这些问题和齐梁之际文学思潮的关系作了种种思考和推论，因此能从较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也更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本书在论到许多具体的学术问题时，往往不仅仅是客观地介绍前人和同时人的看法，还常能对一些说法提出必要的质疑。例如，在讲到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对汉乐府《妇病吟》一诗的断句与一般说法不同时，作者经过仔细考虑，指出萧先生的断句有胜于一般说法之处，但也对这种断句方法提出自己的疑问。在谈到陶渊明的享年问题时，论述了过去梁启超、古直等人曾对沈约、萧统所说的六十三岁说表示怀疑，并提出过五十六岁或五十二岁诸说。这些说法现在已很少有人信从，但作者考

虑到历史上曾有过这种争论，并且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仅云“春秋若干”，而在另一处又说“年在中身”。这“中身”二字出于《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而据《礼记·文王世子》说“文王九十七而终”。照这样看来，似乎与传统所说陶渊明卒年六十三之说尚有距离。梁、古诸说的立论，虽多属推测和猜想，也许还有加以考虑的可能。像这些例子都说明作者既善于思考，也能谨慎地对待学术问题。

如果说这本《中古文学文献学》对前人和今人关于中古文学史中的不少争论问题作了扼要的论述，从而对研究者很有启发的话，那么本书中关于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一些重要选本和总集的论述，似乎尤见功力。有不少论点的提出，显然是作者对那些典籍下了较深功夫的结果。例如在论到清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作者既充分肯定了严氏的功劳和用力之勤，又指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任何总集都不可能把一代的文章搜罗无遗。例如裴子野《宋略》的不少佚文，见于《建康实录》，而此书在清中叶一段时间很少流传，因而严氏未见此书，不能辑入。作者又指出严氏在搜罗古人遗文时，往往把许多零星的佚文设法衔接起来。在这方面，他既有做得很好的地方，有时却难免失误。此说我颇有同感，例如晋鲁褒的《钱神论》，严氏把《晋书》和《太平御览》所载文字归并在一起，其中有个别地方就显得繁冗，甚至和成公绥的同名文章有相同处，其中是否有失误，就很难保证。同样，本书中在论到逯钦立先生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时，不但指出了此书基本上按作者生卒年编排和注明每首诗出处的优点，而且论述了此书在考订具体作家、作品时的得失。如作者认为逯书根据史传所载，北周李昶曾被赐姓为宇文氏，和他小字李

那的事实，把冯惟讷《诗纪》、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误收入隋诗的李那《奉和重适阳关》移入北周诗中，和原题宇文昶《陪驾幸终南山》放在一起，改正为李昶作，这是逯先生考订精当的表现。同时，在谈到逯书中新增的沈约《登北固楼诗》时，指出此诗原出唐张读《宣室志》，系小说家拟托，并非沈约作品。这些都表现了作者在考订古籍方面的功力。又如本书在谈到《玉台新咏》时，提到明寒山赵氏覆宋本虽被研究者视为较近徐陵原貌，却也有些地方可能已被人窜乱。因为在赵本的第六卷中，所收徐悱妻刘令娴诗共三首，而前二首在何思澄诗之前，另一首则在何之后，这说明后一首或系后人所附益，此说很有见地。因此，这部《中古文学文献学》不但对初涉中古文学研究的同志有很大教益，就是对从事研究中古文学工作多年的同志也有所启发。

刘跃进同志是我的博士研究生，1991年毕业后留在文学所工作。由于他在杭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专攻古典文献专业，因此对古代典籍和中古时代的文学与历史都下了扎实的功夫，掌握丰富的资料。他治学勤奋刻苦，善于思考和发现问题。他的博士论文《永明文学研究》，曾获得当代著名学者程毅中、袁行霈、葛晓音等同志的称赞。此书现已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书出版后，曾寄赠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请正，康先生在回信中也颇有好评。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全面论述了永明文学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而且对永明作家的生平作了许多考订。例如“四声说”的创始者周顒的卒年，过去许多学者大抵推测为永明七年（489）以前。刘跃进同志则根据梁释僧祐《略成实论记》、沈约《与约法师书》等材料，考定为永明八年（490）以后，十一年（493）以前。这个结论，可以视为定说。现在这部《中古文学文献学》已经脱稿，

我作为第一个读者，感到深受启发。我觉得以跃进同志的年富力强，而且已经具有这样的学力和识见，一定会有更多的力作问世，不禁企予望中。聊作此序，以志欣喜之情。

1993年3月曹道衡序于文学研究所

引 言

按其性质，这部书应该算作专题研究导引一类的著述，与西文Introduction 或者Reference sources的含义略近，因此叫《中古文学研究导论》更为明晰。然而，“中古文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殊多，远非这样一部小书所能包容。本书所论仅限于作家生平事迹、作品年代、本事、真伪及流传方面的有关史料和研究现状等内容，大体不出文献学范围，所以选取了目前这个有些拗口的书名。

由此不妨引申，把古代文学研究明确地分为文学文献学和文学阐释学两大阵地，彼此有相对的独立性。前者强调对史料进行客观的考辨，重视学术的积累；后者则不免有较多的主观成分，阐发意蕴，寻绎智慧的启迪和情感的娱悦。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曾在大学讲台上讲授过中国古典诗歌，常常依照个人的情思去分析作品。有时，自己的理解与作品的本意相去甚远，但又确有某种渊源关系，而且同学们普遍反映较好。这也许就是文学阐释学的功效，而这种功效的捕获却以不惜割裂作品原意为代价的。这与文学文献学的研究迥然有别。学校希望我把讲义整理出来印发给大家，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我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和激情，也有这样的写作冲动。但是，当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

生把撰著《中古文学文献学》这个任务交给我时，我却非常犹豫，深感功力不够。

平心而论，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纵论古今，考述源流，在国外大都由著名专家学者来充当这个角色。很显然，评述中古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我既没有这个资格，也确实感到力不从心。而两位先生却坚决地把我推向前台，就是要让我从基本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做起，力戒浮躁无根之习。导师的苦心，我自然心领神会。再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近几十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界一直把逻辑的推绎奉为神明，把文学规律的探寻视为研究的终极目的，视为一个学者的真正使命。而史料的收集与考辨，充其量是基础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觉得自己也许适宜于这项工作。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我确实还只是一个初学者，步履蹒跚，就应当从基础做起。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很庆幸有两位老师作后盾，每写成一章，曹、沈二位先生逐段逐字审校考核，匡谬补缺，原稿上批得密密麻麻，提出了许多他们近年来潜心思考的问题供我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我在行文过程中尽可能地反映出来。同时，为了更好地全面反映中古文学史料的研究状况，书中又征引众说，取精用宏，并做到言必有据，详标所本。这样做，可能显得繁琐，但于读者也许不无助益，藉此可复核，作为进一步研讨的线索。当然，有些见解，也许前人早有论及，而我还在称引后人的考证。这种情形我在写作过程中已有发现，并随文作了订正。

众所周知，忽视他人的研究成果，闭门造车，这是学术研究的大忌。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至今仍大量存在。本书的撰著，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为中古文学研究者提供某些

参照，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可惜，对于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涉猎还不是很多，这并不是我有意忽略。1992年初，我的博士论文《永明文学研究》在台湾出版以后，国外一些学者给我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给我触动最深的，是建议我更多地参考一下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这无异于向我提出尖锐的批评。当今世界，学术研究已趋向国际化，强烈的紧迫感时刻敦促我再次补课，而没有别的选择。我曾专程去清华大学向学有根基、训练有素的刘桂生教授讨教西方文献学知识，同时买来诸如《西文工具书概论》之类的教材进行系统的学习和实践，虽是浅尝，确实已获益不浅。原想在本书后附录国外中古文学研究论文(著)索引，适逢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洪顺隆教授主编的《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出版发行，其资料之丰富，囊括殆尽，足资参稽。因而这部分内容，本书只好舍弃不录了，还望读者鉴谅。

1993年3月作者自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序	(1)
引言	(1)

上编 总集编撰与综合研究

第一章 《文选》与《玉台新咏》	(3)
第一节 《文选》的编者、成书年代及文体分类	(3)
一、《文选》的编者	(4)
二、《文选》成书年代	(8)
三、《文选》的分类	(9)
第二节 《文选》的注释	(10)
第三节 《文选》的版本	(16)
一、抄本	(16)
二、刻本	(17)
第四节 《文选》学	(21)
一、《文选》在域外的流传与研究	(21)
二、本世纪前五十年中国《文选》研究	(24)